

川陕苏区的彭杨军事政治学校与红军大学

马建堂

(四川文理学院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

摘要: 川陕苏区时期高度重视干部人才的培养,彭杨军事政治学校和红军大学是两所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重要学校。彭杨学校建立于1933年2月,注重革命理想信念的教育,重视发动下层群众的积极分子进入学校学习,重视军事政治理论与斗争实践相结合;1934年11月,红军大学与彭杨学校合并后建立了新的红军大学,成为苏区后期军政人才培养的关键。两所学校培养了大量的坚持党的理想,军政知识兼顾,注重实战演练,心系人民群众的军政干部,适应了战时体制,成为川陕苏区开展军事政治斗争的重要力量,其干部培养模式和艰苦的办学精神对今天亦有一定借鉴。

关键词: 川陕苏区; 干部; 教育; 彭杨军校; 红军大学

中图分类号: K263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川陕苏区时期,学校教育是培养苏区干部人才的主要形式之一,其中培养军政干部的学校有彭杨军政学校和红军大学,对此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川陕苏区的艰苦奋斗历史和革命成功经验。目前关于这两所学校的研究还不深入^①,相关的史料记载散见于党史资料、地方志、文史资料及将帅回忆录、传记等各类资料,缺乏完整系统的认识,部分史实记载或学者观点也不尽一致,难窥两所学校办学的真实状况。故而,本文拟系统梳理相关资料,全面认识川陕苏区的彭杨学校与红军大学的真实状况,并对当今的干部培训事业有所借鉴。

一.彭杨学校的开办情况

1933年初川陕苏区建立后,在严峻的斗争形式下,为了提高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素质,保持红军的战斗力,急须补充大批政治干部和军事指挥人才,因此,大力开办干部学校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没有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2017年度一般项目“川陕苏区的干部教育及历史经验研究”(17SB0451)

作者简介:马建堂(1985—),男,陕西兴平人。副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E-mail: mjt3630@126.com。通讯地址:四川省达州市四川文理学院南坝校区化学化工学院 邮编: 635000 电话: 13648195233

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1]尤其在通南巴解放后，苏区红军在数量上迅速扩大的同时，建立一支有文化知识的红军干部队伍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担负起保卫和建设苏区的艰巨任务。彭杨学校和红军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

（一）彭杨学校的建立

彭杨学校是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的简称，是以彭湃、杨殷两位革命先烈的英名而命名的专门训练军事干部的学校。中国共产党曾建立了多所彭杨军事政治学校^②，1931年5月鄂豫皖时期曾建立了彭杨学校，校长蔡申熙，于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后停办。

关于川陕苏区彭杨学校的建立时间，据《通江县志》记载，彭杨学校开办于“1933年2月上旬”，^{[2]702}据《通江苏维埃志》记载，1933年2月1日开始筹建，建校基础为“原随营学校”，“上旬在通江城正式开学”。^[3]另据南江县苏维埃政府1933年2月15日翻印的《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记载“建立较完备的彭杨学校，输送好的同志和干部到彭杨学校去。”^[4]该文件中明确提及“彭杨学校”，从此可见彭杨学校于1933年2月开始筹建或已建立。

1933年6月23日《中共川陕省党第二次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明确指出彭杨学校是“培养红军下级政治干部，党应多输送党、团员和积极工农去彭杨学校学习，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5]85}同日，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的任务》中指出：“建立彭杨学校，训练大批军事政治干部。”^{[5]93}1933年6月28日，木门军事会议决定：加强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恢复彭杨干部学校。”^{[6]298}一些文献或著作据此认为彭杨学校建立于1933年7月^③。笔者认为此处的“建立”是主要是在反三路围攻后，红军干部缺乏的情况下，强调彭杨学校的作用，并有完善办学、扩大规模之意。依据为：1933年7月6日，《干部必读》第21期记载彭杨学校“第二期即将开学”，“彭杨学校布置已妥”^{[7]1501}，且第一期培训应有周期，第一期招生工作也于2月中旬开始^{[7]1472}，另据女红军蒲国志口述回忆“1933年元月下旬，德胜区苏派我去通江“彭杨学校”学习”，^[8]故笔者推断1933年2月建校较为可信，第一期培训肯定在1933年7月前，应在2月下旬至6月之间。

（二）彭杨学校的招生宣传

彭杨学校建立后迅速开始了招生工作，1933年2月16日，川陕省苏维埃机关报《川北穷人》第9期发布了《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招生章程》。章程详细规定了入学资格：成分为“贫农、雇工、手工业者以及忠实可靠的中农”，年龄为“18岁以上，25岁以下”。同时规定“不收学费，学校供给膳宿”^{[7]1472}。各区苏维埃

负责报名和转送学员至彭杨学校。该规定从学员成分、年龄、收费等方面保证了彭杨学校的办学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学员有较好的中下层群众基础，苏维埃在学员的选拔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该《章程》内容有三个特征：一是充分体现了革命深入人心的趋势，有效的推动了招生动员，如其中提到宣传马列主义的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使用我们的武器!好与我们的敌人作长久的战争!”二是以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指导，如“准备我们的武装!放下我们的锄头，放下我们的镰刀”，走进彭杨学校，“拿起我们的刀枪!好与我们的敌人作长久的战争!”三是明确了办学宗旨。如彭杨学校是“培养工农干部的地方”，“学习军事政治的机关”，“实习工作的试验场。”

[7]1471

（三）彭杨学校的教学组织

彭杨学校主要为红四方面军培养政治干部人才和中下级军官，直属于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领导，倪志亮、李特先后担任校长，政委由总政治副主任傅钟兼任，教育长先后有李特、吴展。学校初建于离通江城五里公处，不久，迁至红江县涪阳坝，1934年春又迁至赤北县苦草坝特别区得汉城的高鼓楼。

彭杨学校的教学组织分政治和军事两队。政治队学员多从部队优秀党、团干部中抽调，学制8个月；军事队学员多是部队班长以上干部，少部分学员招收的青年积极分子。教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和军事水平，一般要求团参谋以上的干部才能充任。政治课由张国焘、陈昌浩、张琴秋主讲；军事课由军事教员轮流上课。学制半年或一年，但也有因战事需要提前毕业或直接调到部队任职的。

1.政治队教育：一般抽调部队中共党员和工农中学优秀学员入校学习，毕业后派到连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学习课程主要是“政治”，讲授“党章、党的最高目的、最低目的、第三国际、听取有关马列主义理论的报告”，^{[9]24}其次才是军事课和文化课。军事训练与军事班内容相同。

2.军事队教育：从部队选拔班长以上干部或觉悟高、立场坚定、革命意志坚强的工农积极分子，经苏维埃政府介绍参加学习，“主要是学军事”，^{[9]25}课程开设有军事、政治、文化，军事课有打野操，讲战略要点、步兵操典、军事问路、山地路道、桥梁、地形、瞄准射击、装退子弹、投掷手榴弹等，注重实地演习。

3.文化课教育：军事队、政治队的政治课和文化课学习内容相同，只是军事队的文化课学习时间安排较少；文化课由文化教员和各排排长负责指导，另选一名识字班长，每天负责教会10个生字，识字教育抓得很紧，每周测验一次，不会写，不会认的要挨批评。学习好的当场表扬，还发给手巾、笔、习字本、奖旗，以资鼓励。每天早晨出操、收操和晚上点名都要。^{[9]24}另外，学校还有唱革命歌曲，星期天俱乐部举办军人大会等文体活动。

倪志亮作为彭杨学校的校长，高度重视彭杨学校的办学政治方向和教学组织。1933年7月9日，校长倪志亮在《为什么要创设彭杨学校》一文指出彭杨学校“要使每个干部锻炼的似钢一般坚硬之决心，而去做个列宁主义的继承者”，并指出彭杨学校工作上之缺点与错误，“尤其在政治领导上比较弱”。^[10]同时，倪志亮亲自抓实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内容及教学计划，经常亲自授课，和学员一起操练与实战演习。在严格管理下，彭杨学校为红四方面军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

（四）前两期培训情况

第一批毕业学员“有300余人”^{[9]24}，分配到连队担任连排级干部。第一期培训完成后，紧接着开始了第二期培训，此时正值根据地发动仪南、营渠、宣达三大战役前夕，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急需军政干部人才。到1933年7月，彭杨学校“第二期布置已妥”，“设备较前期完善很多，但学生只到百二十三人”，“各军各师除四军及三十军之三十团与九军之三十六团外，其余多未按数送来”，同时指出“各部对训练干部尚缺乏应有决心”。^{[5]1501}1933年8月23日，陈昌浩在《培养干部的提案》中指出彭杨学校“第二期已在开办，人数已有二百六十人，成绩尚好，三个月毕业”。^{[11]48}地方上各县积极性很高，如1933年6月，彭杨军事学校分配给南江200名学员名额，经积极选荐，最后“选出了100余名优秀青年，大多是党团员，年龄在18-23岁”，由方面军总政治部派干部杨波凌前来接到通江学习，以后一年多时间里，县委输送学员“总计在300名左右”，^{[12]116}这些学员大多成长为军事政治人才。

第二期培训1933年10月底结束。10月31日，倪志亮在《彭杨学校第二期工作概况》指出“加紧培养工农军事政治的干部人才来充实与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中领导与指挥的力量”，是彻底粉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主要的工作之一，可见第二期培训是极为关键的。第二期培训有两个特征：一是学生具有良好的革命理想信念。学生都是“农村中基本群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有斗争历史，并且已经接受共产主义的洗礼，具有斗争决心；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作用，洗刷了少数阶级异己分子及不良分子，“克服了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因此，“虽然这期学生数量上很少，所受训练期间也很短，”^{[7]1546}但是终能取得成功。

倪志亮也明确指出了第二期培训的不足：第一，学校设施不完备，工作人员太少，对于教材与时间也没能按照原有计划充分实施，讲授时启发性太差。第二，在管理上缺乏耐心，以至于农村学生对于有规律的学校生活，感觉到枯燥与严厉。第三，学员的考查、选送不严格，“使少数地主、富农混入”等。^{[7]1546}

（五）关于第三期培训

由于资料的限制，以往资料多认为培训只开展了前两期，较少提及第三期培

训。1933年8月，陈昌浩指出“第三期不久即开始准备，要扩大到六百人以上，并拟设高级班”^{[11]48}。1933年12月6日第27期《红军》报登载《彭杨学校第三期开学，庄严热烈的盛大开学典礼》，“在第三期学生尚未到校中，提早于前日“举行盛大的开学典礼”，会场“布置得非常庄严热烈，各机关均有代表参加致词”^[13]。学员要求学习军事、政治的热情很高。可见，第三期培训于1933年12月4日进行了开学典礼，但第三期培训详情记载较少。1934年春五月，红军将彭杨学校迁驻得汉城，“时有学员130人，编为三个排。”^{[2]702}刘瑞作诗《通江得汉城》写到“川苏置腹心，彭杨训基干”，^[14]对彭杨学校在得汉城办学经历予以肯定。

（六）学员的学习与战斗

彭杨学校的学员学习都很刻苦，纪律性强，由于得汉城设立的红军机关多，住房极为困难，学员自己平整土坝、砍树、割茅草、搭棚子，住的是茅屋，睡的是树条绑的大铺。教室设在高鼓楼，上课坐的是土砖，尽管学习条件很差，但学员学习劲头十足。

除学习外还要参加劳动、打仗。在艰苦的军事斗争中，学员随时要准备战斗，打起仗来很勇敢，如在一天夜里土匪偷袭得汉城，全体学员奉命出击，“把匪首李宗品的扇子队打垮才胜利回营”^{[9]25}。再如长赤县沙溪学员王朝品，“学习中途被派到部队任连长，在万源保卫战中英勇牺牲”；巴中彭杨学校政治教员徐茶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留学苏联，1931年回国，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入川，在彭杨学校任教，1933年3月8日在南龛坡战斗中光荣牺牲。^{[9]25}

南江县关坝乡元山观杨姓人家有个16岁的青年，家里只有60多岁的双亲。区委书记杜茂科动员这名青年入彭杨学校，但二老却说：“我们就靠这娃儿吃饭罗！”后来该青年被成功动员进入彭杨学校学习，关坝乡苏维埃把两个老人的柴水等全部包下来，老两口安度晚年，儿子学校毕业也参加了红军。^{[12]116}

二、红军大学

（一）关于建校基础和时间

关于红军大学的记载见于地方志、文史资料和党史资料中，围绕建校基础和时间问题，相关记载或学者认识不尽一致，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1.红军大学由彭杨军事学校更名而来，改名时间有1933年11月中旬、12月、12月后，1934年8—9月间，1933年8月等多种说法。

《旺苍县志》对此有两处记载，且不一致。一处为：民国23年（1934年）

11月中旬，彭杨军事学校迁旺苍五峰灵溪寺，并改名为“红军大学”。^{[15]594}另一处为：民国22年（1933年）红军在五峰山古刹灵溪寺内设“红军大学”^{[15]602}由于1933年红四方面军总部尚未迁至旺苍，可见第二处明显错误的。

《旺苍文史资料 第14辑》记载：1934年，川陕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机关相继由巴中迁到旺苍，其中“彭杨军政学校驻旺苍城郊灵溪寺。并于12月改名为红军大学”。^[16]

《广元县志》记载：1934年10月。红四方面军“彭杨军政干部学习”迁到旺苍坝，同年12月，改名“红军大学”。^[17]

《蜀门红旗——川陕苏区广元史略》认为：1934年9月，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由通江迁到旺苍坝灵溪寺，同年12月更名为“红军大学”。^{[18]178}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5卷）记载：1934年12月后，彭杨学校“扩编为红军大学”。^[19]

《中国红军发展史》认为：1934年8-9月间，在四川巴中县青冈坡，将彭杨军政学校改成红军大学。^[20]

《红军人物志》记载：彭杨军政学校于1933年8月改为方面军红军大学。^[21]

《历史的回顾(中)》记载：清江渡会议后，彭杨干部学校改称“红军大学”。^{[6]386}

另有学者撰文认为：1934年12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扩编为红军大学，^[22]校址在旺苍城南的灵溪寺。

2.红军大学的建校基础是红军高级军事学校，后改名红军大学，后来彭杨学校和已建立的红军大学合并（或彭杨学校并入红军大学），成立新的红军大学。

《四川省志·教育志(上)》记载：1933年7月前后，红四方面军兴办了红军高级军事学校，后“改名红军大学”。^[23]

《革命文化制度探索·中国苏区教育研究》认为：红军大学的前身是“红军高级军事学校”，于1933年3月在通江城成立，1934年迁到赤北县，“正式改名红军大学”。后彭杨军事学校也并入红军大学。^[24]

《简明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认为：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在川北通江县恢复了原来在鄂豫皖苏区创办的红军大学和彭杨军事政治学校。1934年红四方面军西征，这两所学校“合并为红军大学”。^[25]

《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九十年》认为：红军大学“原称红军高级军事学校”，“于1933年3月在通江城文庙成立，迁赤北县得汉城后改称红军大学”。1934年与彭杨学校合并后迁往旺苍坝灵溪寺，“吸收了近1000名青年入学”。^[26]

《战旗飘飘无往不胜——徐向前元帅在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战史办公

室撰写)认为:1934年11月,“在巴中清江渡,成立了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27]开始正规地大批培训干部。

《川陕苏区教育史》认为:1934年3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在通江城文庙,“创办高级军事学校,后迁得汉城更名红军大学”,直属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反六路围攻开始,红军指挥部迁洪口,红大随指挥部迁驻洪口张家坡。1934年12月上旬,“彭杨学校与红军大学合并,”^{[9]25-26}总称红军大学。

3.红军大学由彭杨学校与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大队合编而来。

《忆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徐深吉回忆)记载:彭杨军政干部学校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大队,合编为方面军红军大学校,“1934年11月中旬,“红大”在巴中县清江渡成立”^{[28]160},校长由倪志亮兼任,副校长兼教育长李特。由于徐深吉为红大教师,故此资料可信度较高。

综上,根据多方资料,笔者认为红军大学的建校基础不仅仅是彭杨学校,应还有红军高级军事学校或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大队。另据1934年12月15日《干部必读》第98期确切记载,“红军大学已开学”,“现正在加紧工作”,^{[1]224}但具体开学日期不详,内分高级班、教导队、初级班、政治班及特种兵器班。同时结合徐深吉的回忆,笔者推断:1934年11月,彭杨军政学校与原红军大学或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大队在巴中清江渡合并,建立了新的红军大学。之所以有诸多资料记载红军大学由彭杨学校“改名”而成,其原因有:一是彭杨学校主要培养基层军事政治干部人才,招生规模较大,在根据地发动了广泛的招生宣传,信息流传较多,基层影响较大,容易被多种资料记载,尤其是回忆性质的文史资料和地方志。二是红军大学主要是培养高级军政干部人才,人数不多,在战时乃至解放后都为严格保密性质,故其记载资料较少。三是结合前两者因素,多数党史、地方史志资料编辑中相互借鉴较为普遍,以至于资料在转载辑录中较多出现红军大学是由彭杨学校“更名”的记载。

(二)红军大学的办学情况

红大第1期学员为彭杨学校和方面军教导大队的学员,设有“高级班、中级干部队、军事连、政治连、特科队,每队(连)100余人”,中级干部队是由教导大队编成的,徐深吉以总指挥部参谋的身份负责中级干部队的课程教学。1934年底,方面军后方机关转移到广元县旺苍坝(今旺苍县城)。1935年1月,“第1期学员毕业”,^{[28]160}倪志亮、李特也调离红军大学。

红大“第2期于1935年1月在旺苍坝开办,”^{[28]160}张国焘兼任校长,徐向前、陈昌浩兼任副校长,徐深吉任军事主任。第二期有1个中级干部队,“下辖四个排,全队170余人”^{[28]161}。2月中旬,在旺苍坝由王树声、李特亲自组建了总部直属“水兵连”,^[29]以红军大学“中级干部队第1排和第30军、第31军教

导队各一个排组成”，“连长杜万荣”^{[28]161}，全连四个排，16个班，战士们冒着二月严寒到歧坪、元坝等地训练，在后来渡江中发挥了先锋和桥梁作用。

通江洪口是红军大学重要的办学地点之一，此时红大“有学员90人，编为三个排，着青色服装，八角帽，骑战马，挎手枪，装备精良。”^{[9]26}学员是从部队中抽调有实际工作能力和战斗经验丰富的师团级干部入学深造，学制半年，也有因工作需要提前毕业，或直接派到部队指挥作战。如战斗中指挥人员不幸阵亡，就由红大学员去代理，直到战斗结束。

红军大学学员主要学习“制式教练、技术训练、战术训练、政治教育”四个方面的内容。高级班、中干队、军事连、教导连、特科队、特别班“以军事训练为主”，政治队“以政治学习为主”。训练方针注重从部队实际需要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实际上是红大的校风。^{[28]161}

苏区各地广泛发动青年进入红大学习。1935年1月13日，“陕南发动青年学生近一千人，”为红军大学输送了新鲜血液。张国焘、陈昌浩在接见这批青年时说：“你们都是有知识的学生，从今天起你们就是红军大学的学生了”。^{[9]26}林英安、张琴秋等都曾到红大学习，据红大学生牛富海（建国后任重庆市教育局局长）回忆：红91师政委林英安打了败仗，离职学习，组织任命我代理政委，“林在红军大学学习40多天，又回到部队”，张琴秋“调到红军大学白区工作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分配在西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队任队长。”^{[9]27}

（三）苏区领导人与红军大学

苏区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都在红军大学讲过课和作过报告，指挥部高级将领担任教官，分别讲授党的建设、红军政治工作、步兵作战条令。徐总除讲课外，“还亲自指挥学员进行实战演习和总结作战经验”，经徐总批准，“指挥部警卫营归红军大学指挥，进行实战演习”。^{[9]26}给学员们以极大鼓舞，也体现了川陕苏区对红军大学的重视。川陕省苏维埃副主席余洪远同志也回忆到：“红军总部张国焘、陈昌浩，还有袁克服、熊国炳常去，向前也去，他们还讲课”。^{[9]26}

徐向前认为培养部队的过硬作风，其关键在于干部。“只有不能打仗的官、没有不能打仗的兵。兵是干部带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干部，就会有什么样的兵”。^[30]徐向前很重视红军大学教学，并注重教学方法，有一期学员快毕业时，徐向前同志亲自到校对学员进行口试。徐总问学员们：“我们在战场上捉住敌人，是杀还是不杀？”有的学员回答：“要立即杀掉。”有的说：“不该杀。”于是展开了一场大争论，徐总亲切的说到：“为了有利于瓦解敌人，我们不应该杀掉俘虏，相反，还应该优待他们才对。这样敌人中对抗的力量就会减少，有的还会向我们

投诚。有的还会为我们当宣传员”。故而，从斗争实际来看，有时“政治攻势比战场上的真枪实弹还强”。斗争中必须讲究策略。^{[18]178}徐向前一席话令学员们心悦诚服。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红军大学改编为方面军干部大队，随军长征，6月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11月，红4方面军红军大学并入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新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28]166}校长刘伯承。1936年12月，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红四、红二方面军的红军大学一起编入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启了红军大学的新阶段，1937年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即著名的“抗大”。

三、彭杨军政学校和红军大学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曾出现了多所彭杨学校和红军大学，为革命培养大量的忠诚可靠、勇于担当的革命人才。川陕苏区的彭杨学校和红军大学的历史地位亦应被肯定。

（一）两所学校是为苏区培养了大量的军政干部人才，在长期的辗转办学历程中，通过军事政治理论教育与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形式，验证了军政人才培养的成功模式，并进行持续探索和完善，虽有一定不足，但基本适应了战时体制的需要，有力的支持了川陕苏区军事斗争和苏区建设走向深入，为中共后来开展军队干部教育积累了经验。

（二）随着革命发展的需要，两所学校培养的人才参加了红军川西会师，北上陕甘后许多人才活跃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甚至新中国建设中。如孙洪道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红四方面军彭杨军政干部学校通信员”、“红军大学司号员”等，^[31]参加了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作战和红军长征，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功勋卓越，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结 语

川陕苏区的彭杨学校和红军大学是苏区彭杨军政人才的摇篮，其长期艰苦办学和革命斗争对今天干部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今天的干部教育中，不能忘记土地革命时期学员们艰苦学习、英勇斗争的历程，要深入思考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培训中要坚持党的理想，军政知识兼顾，注重实战演练，心系人民群众。如彭杨学校学员除了学习外，“星期天还要下山帮助老百姓拔谷桩，种胡豆。”

¹⁹²⁵今天的干部教育探索在不断创新,如达州市于2017年12月18日成立以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教育为主题的党性教育基地——巴山红军学院。巴中市于2017年11月成立大巴山干部学院。笔者也衷心希望两所干部学校要牢记历史,缅怀先烈,汲取能量,为当代中国建设培养合格干部人才。

注 释:

①参见章江心.浅析川陕苏区的彭杨学校[J].四川文物,2003(05):80-81;卢庆洪,卢秀芹.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红军大学[J].党史博采(纪实),2009(08):51-53;卢庆洪.中共历史上的七所彭杨军校[J].党史博采(纪实),2011(02):56-59。三篇文章对川陕苏区的彭杨学校和红军大学有一定论述,但不深入。

②参见①。

③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辞典》编委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辞典[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519;易凤林著.革命文化制度探索.中国苏区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161。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11.
- [2] 四川省通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撰.通江县志[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 [3] 中共通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通江苏维埃志[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411.
- [4] 西华师范大学李健、蔡东洲,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册)[G].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44.
- [5] 西华师范大学李健、蔡东洲,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册)[G].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 [6]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 [7] 西华师范大学李健、蔡东洲,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册)[G].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 [8] 政协四川省平昌县委员会文史教卫体委员会.平昌文史资料(第2集)[G].1992:79.
- [9] 刘瑞怀,刘桂元.川陕苏区教育史[M].川陕苏区教育史编写领导小组,1992.
- [10]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上)[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442.
- [11] 四川省档案馆编.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G].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 [12] 中共南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 [13] 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辑.川陕苏区教育史文献资料选编[G].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

馆,1985:95-96.

- [14] 张崇鱼主编;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管委办,纪念馆编辑.将帅碑林●红色华章[M].2007:249.
- [15] 四川省旺苍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旺苍县志[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 [1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旺苍县委员会.旺苍文史资料(第14辑)[M].1996:62.
- [17] 广元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元县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688.
- [18] 中共广元市委党史工委《蜀门红旗》编委会.《蜀门红旗》—川陕苏区广元史略[M].1988.
- [19] 王 淇,陈志凌主编;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5卷)[G].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166.
- [20] 王健英著.中国红军发展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413.
- [21] 王健英.红军人物志[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361.
- [22] 卢庆洪,卢秀芹.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红军大学[J].党史博采(纪实),2009(08):51-53.
- [23]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教育志(上)[G].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13.
- [24] 易凤林著.革命文化制度探索·中国苏区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162.
- [25] 宋荐戈,张腾霄著.简明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166.
- [26] 吴林根著.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九十年[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66.
- [27] 徐小岩主编.徐向前元帅百年诞辰纪念文集[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231.
- [28]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院校回忆史料[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 [29] 中共旺苍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编.旺苍党史资料●红军在旺苍(第3辑)[G].1986:20.
- [30] 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上[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239.
- [31]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人物志[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198.